

安源罢工中的刘少奇同志

武锦莲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同志，在他早所从事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工人运动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二年他与李立三同志具体领导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就是工人运动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开展全国的工人运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进一步加强了工人运动的领导。由于党的积极领导和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从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在这次高潮中，由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同志领导的安源路矿大罢工，是一面胜利的旗帜。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把安源大罢工的领导人刘少奇同志诬蔑为出卖安源罢工的“工贼”，说他在罢工开始时反对罢工；在罢工运动中挥舞“文明罢工”的大棒破坏运动；在谈判中，牺牲工人的根本利益与资本家做交易。历史果真象“四人帮”一伙所雕塑的那样吗？否！这是对刘少奇同志的最无耻最卑鄙的政治陷害！

刘少奇同志究竟是破坏安源大罢工的“罪魁”，还是大罢工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是首先必须分清楚的历史是非。

安源路矿是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是一个充满着阶级仇、民族恨，蕴藏着革命烈火的场所。一九二一年秋，毛泽东同志曾去安源，深入煤井和工棚，了解工人疾苦和要求，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在安源工人中播下了革命种子。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同志又派李立三、蒋先云等去安源，以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通过“十人团”、“百人团”等形式组织工人，成立了安源工人俱乐部，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九二二年九月罢工前夕，俱乐部会员已发展到七千多人。这就引起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恐慌。反动的路矿当局妄图解散工人俱乐部，镇压工人运动。正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在九月上旬再次来到安源，同党组织和俱乐部负责人一起分析了形势，作出了大罢工的决定。九月十一日，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为了加强对罢工的领导，派刘少奇同志来到安源，具体领导罢工斗争。

刘少奇同志到安源后，立即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会上，对要不要罢工问题争论非常激烈。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少奇同志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立即举行

大罢工的条件已具备，这就是：工人群众觉悟已迅速提高，斗争决心很大；工人俱乐部在群众中已有很高威信，只要俱乐部一发动，绝大多数工人都会行动起来；敌人是害怕罢工的；当局的东家是帝国主义，如果我们一罢工，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就交不了差。经刘少奇同志这一分析，大家意见立即取得一致。恰巧这时又接到劳动组合书记部来电和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信中说“……请你们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伏，我们之奋斗精神，自有奋斗之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你们表示无限之同情，决议设法为诸君声援”。于是，决定十四日晨四时全矿举行大罢工，并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在斗争中采用“哀兵必胜”的策略，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等“哀而动人”的口号，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大罢工实现后，少奇同志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领导群众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路矿当局为了破坏罢工，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都未得逞，最后只得武力相威胁，派兵到俱乐部抓人。但刘少奇同志从容不迫，义正词严地回答着敌人的问话。当士兵与工人要发生冲突时，少奇同志从人群中站出来，对士兵讲：“弟兄们，我们都是苦同胞！你们出来吃粮（即当兵）是为了要吃要穿，是为了活命；我们罢工也是为了要吃要穿，为了活命！我们的工钱被当局扣了不发，连吃粥都吃不上了。我们再三向当局要求发清欠饷，当局也不答复我们。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活不成了！我们要死里求生，才迫不得已罢工！……”士兵们听了这一席话，深受感动，举起的枪慢慢放下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刘少奇同志在安源罢工开始时，不仅不反对罢工，而且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组织和发动这场斗争积极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四人帮”为了颠倒这段历史，以诬陷刘少奇同志，举出刘少奇同志曾说过这次罢工是“挺而走险”这句话，作为反证。

一九二三年九月廿九日，为了纪念安源罢工胜利一周年，少奇同志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关于萍乡煤矿工人罢工》的报道，说过上述那句话。但决不能作为少奇同志反对罢工的“罪证”。因为：第一，这话是一年以后说的，并不是在罢工开始时讲的；第二，这句话根本没有任何反对罢工的意思，而是说罢工完全是路矿当局逼出来的，工人受压迫太重，无法生活下去，在正常情况下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都遭到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拒绝。为了求生存、争自由，不得不采用罢工斗争的非常手段。这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在少奇同志到安源之前，九月初，路矿当局阴谋解散工人俱乐部，要蒋先云等同志离开安源，不然“必有杀身之祸”。但安源工人不怕威胁，不仅不同意解散工人俱乐部，反而针锋相对地提出要路矿当局保护和津贴俱乐部，发清工人欠饷等要求。路矿当局断然拒绝，坚持要解散工人俱乐部。工人忍无可忍，只能以罢工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这个历史过程，少奇同志用“挺而走险”四字概括是无可非议的；第三，少奇同志这样讲有利于争取社会同情，使安源工人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这是“哀兵必胜”策略的继续运用，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安源罢工中，少奇同志在谈判桌上是一个捍卫工人利益的无产阶级英勇战士，还是一个所谓出卖工人利益的“懦夫”、“叛徒”？

“四人帮”说刘少奇在罢工过程中，提出“文明罢工”的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斗争。在与资本家谈判过程中达成的十三条协议，是投降主义的产物，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文明罢工”是“四人帮”罗织的莫须有的罪名。在罢工中，工人俱乐部的任何领导人都没有提出过这个口号。一九二三年，刘少奇同志和朱少莲同志写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

史》中提到当时工人曾向俱乐部提出：罢工后要比“平时更加文明”。显然，这句话并不是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同时，从这句话的前后文看，“文明”是指罢工时，工人阶级要有组织性纪律性，要维护革命的秩序，不要给敌人以任何借口来破坏工人运动，这有什么错呢？

安源罢工坚持到第三天，路矿当局恐停工过久损失太大，便派人出面调停。经过协商，由工人代表、商会代表和路矿两局代表三方面进行谈判。少奇同志被工人一致推举为谈判代表。谈判地点设在戒严司令部。谈判开始时，路矿当局妄图以武力逮捕罢工领导者刘少奇同志，所以在谈判场所的周围布置了全副武装的卫兵，架设了机枪，弹上膛，刀出鞘，虎视眈眈，杀气腾腾，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戒严司令恐吓少奇同志说：“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少奇同志大义凛然，毫无畏惧地回答：“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司令又威胁：“我对万余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刘少奇同志愤然说道：“就请你下令制裁去！”为了防备敌人谋害自己的代表，数千工人包围了戒严司令部，岗警用刀枪也赶不散。工人们看见刘少奇同志进去了许久，还不见动静，就一起轰喊起来：“快让我们的代表出来讲话，不然我们就冲进去啦！”路矿当局见工人动怒，就只好让刘少奇同志出来和工人见面。工人见刘少奇同志出来，就停止轰喊。这样，工人们每过一刻钟，就要叫工人代表出来一次。由于刘少奇同志的坚决斗争，又有数千工人作为坚强的后盾，不仅粉碎了敌人妄图谋害少奇同志的阴谋，而且到了十七日午夜两点，经刘少奇同志据理力争，与路矿当局达成保障工人的政治权利、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十三条协议。十三条协议与罢工开始时提出的十七项条件相对照，内容基本一致，对有些要求，工人作了必要的让步，有些要求则合并到十三条中去了，维护了安源工人的利益。所以说，十三条协议是斗争的产物，决不是叛卖的结果，它标志着罢工的胜利。正因为十三条协议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要求，所以反动派沮丧，安源工人欢呼。萍乡煤矿矿长因此事而向总公司辞职的报告中说十三条是“迁就”工人的。安源工人知道后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从此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威望倍增。因此无论从十三条协议的内容看，还是从它签订的过程以及结果看，只能说它是斗争的产物，胜利的成果。

刘少奇同志在安源工人斗争中，不但胜利地领导了大罢工，而且又巩固了安源斗争的胜利成果，成了安源红旗的维护人。

安源大罢工后，李立三同志因党的工作需要，调离安源去汉阳工作，安源俱乐部的一切重责皆由刘少奇同志担任。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各地工人团体都先后遭到破坏，唯安源俱乐部仍傲然屹立，而且发展壮大，这固然同毛泽东同志的“以弯弓待发的姿态”开展工作的战略和策略思想的指导分不开，但也不能抹煞安源俱乐部的直接负责人刘少奇同志的功绩。

“二·七”惨案后，安源路矿当局曾得到北京伪交通部来电，命其封闭安源俱乐部。同时，汉冶萍公司亦电告当局，用送厚礼等方法买通当时驻江西的督军及赣西镇守使，要求他们采用武力封禁俱乐部。但是，俱乐部在刘少奇等同志的领导下早有戒备，先行动手，努力训练工人，巩固组织，使得路矿当局未敢轻易封禁俱乐部。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安源工人俱乐部召开全体部员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一周年。会议非常隆重，全国各地工人组织皆来电祝贺，党的各地区负责同志亦来安源，明确指出安源工人今后的斗争方向和任务。李维汉同志当时是湖北省委书记，他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一万二千余路矿工人，举着红旗高呼“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

小时教育”，“俱乐部万岁！”等口号，从安源游行到萍乡，又由萍乡游行回安源，历时一天。这次大游行，是向敌人的有力示威，是工人阶级对自己力量的一次大检阅。

安源工人运动在全国工运低潮时没有受到损失，相反有所发展，还表现在：俱乐部建筑了新房子；工人子弟学校扩充为八所，学生成千；党的组织处于半公开状态。

一九二三年夏，刘少奇同志到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到安源，继续领导工人运动。为了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刘少奇同志等制定了安源工人俱乐部章程，宗旨为“联络感情，涵养德性”，在经济上互相支援。这是隐蔽工运骨干，保存实力的极好策略。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革命策略被批判为“反革命经济主义”、“放弃政治斗争”等等。

刘少奇同志自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一日到安源，直至一九二五年春离开，在安源将近三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为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不辞劳苦，使安源成为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中心之一，荣获“小莫斯科”之称。他在这方面的功绩，将永垂史册，彪炳千秋！

刘少奇同志生活片断

——记王光正同志的谈话

最近，我们曾走访王光美同志的二妹王光正同志。她给我们谈了她过去与刘少奇同志接触的一些事情和感想。

王光正同志现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她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先是无限感慨地说：“要不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少奇同志的冤案是不可能平反昭雪的。”

接着，王光正回忆说，我过去和刘少奇同志接触的机会并不多，见面的时候，谈的都是些家常话，他总是问问工作情况，要求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党交给的工作做好。我住上海，他们在北京，有时他们到上海来，在会议或接待外宾的空隙时间，打电话让我去碰碰面。有时留住吃饭，也不添菜。刘少奇同志还让服务员记上“客饭”，自付饭费。离开时，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用小车送送三姨吧！”但光美都婉言阻拦。我还是乘公共汽车回家。刘少奇同志的生活是很俭朴的，文化大革命中说刘少奇的生活怎样怎样，全是捏造的诬陷不实之词。记得一九六一年我去北京看望母亲时，还协助母亲给少奇同志的孩子补过不少衣裤。刘少奇同志就是这样，在这些生活小事上也不忘党的优良传统。

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同志的迫害。王光正同志愤怒地说，林彪、“四人帮”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刘少奇同志含冤至死，在他病重时不仅不给治疗，只给打一点葡萄糖，并恶毒地说，给他拖一点时间，让他自己亲耳听到中央对他的决定。在决定宣布后，刘少奇同志被押送出北京，不久在河南开封的监狱里，他心脏停止了跳动，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对中国革命有卓越贡献的国家主席，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

王光正同志说，现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我们心情很激动，这要感谢我们的党。我们的党确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快六、七十岁的人了，我们劲头还很足，都想为“四化”多作贡献。

（饶明华 梁红英）